学習時報

第770期
2015年1月5日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报名题字：江泽民

STUDY TIMES

网址：www.studytimes.cn 周一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37 代号：1-267

重要言论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适应新常态 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答本报记者问

高层访谈

□本报记者　李玉梅　云　帆

编者按：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开，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一主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形势？农业如何适应新常态？

韩长赋：农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更为迫切。这是中央全面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深刻分析农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战略要求。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新常态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紧迫又长远，只有主动适应新常态，农业农村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新常态，首先必须更加重视农业、稳定农业。农业农村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是调节劳动力就业波动的“蓄水池”，是扩大消费新的增长点。只有持续不断夯实农业基础、巩固发展稳粮增收好形势，稳定农产品供给和价格，才能为适应新常态稳定市场信心、扩大回旋空间、增强应对底气。适应新常态，必须着力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农业发展环境、条件和要求都将发生相应变化，面临的新老问题和矛盾将更加突出，只有内强素质、外迎挑战，加快转型、创新发展，才能突破制约，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农业基础。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已经到了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历史阶段。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腿，不能再“滞后”下去了。实现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巩固农业基础的根本途径，从现在起，必须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时期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完成好稳定产量、保障供给的首要任务，又要兼顾好提高产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既要适应国内发展环境，又要放眼国际竞争态势；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又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目标，以改革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强化政策法治、设施装备、人才服务等支撑保障，建立完善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经营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保护体系。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如何应对农业发展的现实挑战？

韩长赋：是的。为了应对农业发展现实挑战，必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但各种风险和结构性矛盾也在积累聚集。突出表现在：农业资源偏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制约日益突出，多年来资源条件已经绷得很紧，农业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等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更高，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挑战日益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务农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今后“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已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农业生产结构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区域布局与资源禀赋条件不尽匹配，北粮南运与南水北调并存；粮经饲结构不合理，一些农产品库存增加与部分农产品进口增加并存；种养业结合不紧、循环不畅，地力下降与养殖业粪污未能有效利用并存。农业比较效益低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国内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农产品价格却弱势运行，导致农业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已不同程度低于我国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导致进口持续增加，成本“地板”与价格“天花板”给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带来双重挤压。上述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暂现象，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都倒逼着农业必须“转方式、调结构”。

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这些年，农业虽然保持了增粮增收的好势头，但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生产与环境、当前与长期等方面矛盾上升。我国农业发展方式仍然是传统与现代并存。虽然农业技术设施装备条件逐步改善，但“毛细血管”不发达、“最后一公里”不到位、农业投入品利用率不高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虽然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但小规模经营仍占大多数，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但很多地方农民依然是按习惯种养，凭感觉种养，跟风种养，走不出“多了多、少了少”的烦恼循环。虽然我国是种养业生产大国，但农业区域比较优势还未充分发挥，农业产业链条不完整、不衔接仍然是我们的软肋，生产、加工、流通、消费脱节，农业内部潜力挖掘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只有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才能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发展质量和经营效益，才能使农业成为有前途、有吸引力的产业。

加快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面临着难得机遇。当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保障。连年丰收后，主要农产品库存充裕，有的达到历史高点，国内外经济增长放缓，使农产品出口、消费和加工需求增长有所减弱，农业生产保数量的压力会有所缓解，这为推动农业发展由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效益、生态、安全并重转变打开了时间窗口。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全面实施，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留出了余地。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底线。农业生产可以由过去的保全部、保所有向保重点、保口粮转变，这为结构调整提供了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资源空间。农产品消费水平提高，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增添了拉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7000美元，进入食品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阶段，人们不仅要求吃饱吃好，而且要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未来优质安全生态农产品市场广阔、潜力巨大，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条件。当前，全球谷物总体产大于需，大宗农产品库存消费比均处于历史高点。这为我们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调剂国内余缺提供了现实可能和操作空间。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结构，推动农业发展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

记者：那么，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是什么？

韩长赋：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科技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转方式，重点是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真正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依靠资源和物质投入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调结构，重点是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资源禀赋特点，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生产优先序和区域布局，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种养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

记者：新形势下“转方式、调结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粮食生产还要不要抓那么紧？其次，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

韩长赋：关于粮食问题，中央的态度十分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绝不意味着放松粮食生产，绝不能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李克强总理要求，粮食决不能出现大的滑坡。推进结构调整，绝不是简单调减粮食，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几次深刻的历史教训！无论怎样转、怎样调，都绝不能把粮食产能调低了、耕地调少了，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更加注重提高粮食产能，挖掘粮食生产新潜力。当前关键是要稳产量、提产能。稳定粮食产量是前提。“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是更均衡更全面的发展观，并不意味着产量不再重要，粮食不可能总是增产，但绝不意味着粮食生产可以放松。中国有十几亿人，而且人口还在增加，消费水平还在提高，粮食问题丝毫马虎不得。我们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当然，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谷物、口粮保住，在此基础上，统筹兼顾棉油糖、“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提升粮食产能是根本。有产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才有底气。要坚持“一稳、两保”：就是粮食播种面积特别是谷物播种面积总体稳定；加大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保护调动好农民务农种粮和主产区重农抓粮两个积极性。从长远来讲，要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下转第9版）

时势专论

推进反腐系列评论④

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

□本报评论员　王金龙

近期又一位副国级高官的最终落马，再次彰显党中央强力反腐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对一个个腐败案所揭露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反复警醒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在对腐败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对腐败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

对腐败惩处的尺度松是腐败易发多发、长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回顾这些年来的反腐历程，虽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教训，比如以往在惩处各种腐败案过程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例时有发生，一些贪官被从轻发落，对照有关刑法条款，该判死刑的被判死缓，该判无期的被判有期，该判刑的则用纪律处分代替，等等。对腐败惩处的尺度松，腐败的成本低，就会导致法律缺乏应有的威慑力，因此一些官员心怀侥幸，愿意冒险，敢于冒险，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出现“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的“壮举”。腐败的收益高于甚至明显高于成本，客观上就会怂恿贪腐，起到“示范”效应，使腐败不断蔓延，造成边反边腐的局面。惩处腐败的尺度之所以宽松，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一些模糊认识造成的，比如：把强调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理解为惩罚可以宽一些，把“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作为从轻从宽处理的必然依据；有些是觉得党培养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容易，不忍心严处；也有一些是对不太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款理解有偏差造成的。另一方面往往是办案人员及相关人员造成的。因有什么人打招呼，或者出于私心私利，有意无视法律，践踏法律，人为降低执法标准，放松惩罚尺度。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纠正。

如何做到始终保持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

其一，澄清模糊认识，强化“严”的观念。既然对腐败惩处不严，是想腐、愿腐、敢腐的重要原因，那就要“严”字当头。当前腐败现象依然时有发生，有人仍然不收手，继续顶风作案，反腐形势依然严峻，斗争依然激烈。在此形势下，如果我们心怀慈悲，善良的愿望可能就被利用，放松的惩处尺度可能就成为对腐败分子的放纵，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同时，还要认识到，以人为本决不排斥严格监管，文明执法也决不排斥严格执法，“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等不应简单地成为从轻从宽处理的砝码。通过严惩，让腐败分子承担政治、经济上的高昂代价，达到有效遏制贪欲的目的。

其二，完善法律条款，统一惩处标准。从宏观上说，要着眼于形成一套全方位的惩罚体系，进一步加强惩治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制定并不断完善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从微观上说，为方便办案人员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惩处尺度，更好地发挥法律的惩戒功能，要对刑法等相关法律的一些宽泛条款进一步修改完善，重点是为惩治腐败统一标准、规范程序，能具体的尽量具体，能量化的尽量量化。对确实难以具体的，要加强典型判例示范和相关条款理解把握能力的培训。

其三，加强监督检查，严惩执法犯法。将“文明执法”泛滥成“人情化”执法，特别是为一己私利放松对腐败的惩处尺度，势必使法律法规对腐败失去应有的威慑作用。所以，对执法队伍，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引导，使他们真正成为严守宪法和法律，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彰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者；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明里制定规则，暗里破坏规则；明里遵循规则，暗里践踏规则”者，严惩不贷。特别是对于那些打招呼干预纪检、司法的领导干部，应该及时进行法纪处理，并公之于众，以儆效尤。这样才能有效治理有法不依特别是执法不严乱象，为始终保持严厉惩处腐败的尺度不松提供可靠保障。

着力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

□熊若愚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长江经济带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提出建设面向全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湖南、上海考察时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构想。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占全国的21%，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发展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必将被打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人口的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很不均衡，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将国土区分为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在国家层面长期推行向内陆地区倾斜的政策。改革开放后，以建设深圳经济特区为发轫，国家着力推进了沿海发展战略。1986年，全国人大在立法层面将政策性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90年代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国家区域战略。应该看到，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也都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进入新中国发展的第三个30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打造长江经济带，彻底改变了沿海与内陆、东中西部这种纵向划分的区域发展战略思维，第一次将东中西部三大发展区域贯穿起来，构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这正是着眼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关键抉择，体现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新飞跃。

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规律，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我国长江流域9省2市，是一个典型的横贯全国的雁行发展形态：地处长江下游的苏浙沪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步入发达地区的行列；处于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等6省市，大体上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而地处西部的贵州、云南则还处于向中等发达地区攀登的阶段。这种梯级发展形态，蕴藏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后劲。打造长江经济带，促进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将构建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促进领域内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形成直接带动超过1/5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建设。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4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后，中央有关部委和相关省市陆续出台了一批新政策和新规划，长江经济带建设进入启动实施阶段。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打造长江经济带，关键在实际行动，核心在实施项目，尽快实现区域内交通、市场、资本和人口贯通和聚集，构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一是加速交通联通。以沪宁杭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已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的行列，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以成渝为核心的长江上游城市已有良好基础。建设长江经济带，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空中、地面、水上以及地下管道全面贯通的立体交通体系，将三大城市群全面贯通起来。二是加速市场贯通。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构建优势互补、互联互通的长江领域一体化大市场。三是加速资金融通。组建长江开发银行，专门为长江经济带跨省市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四是加速人口聚集。降低长江领域大中城市户口准入门槛，实施划拨住宅用地等积极的住房政策，加快城镇化建设部分，实现人口聚集，从而串联起长江领域数以百计的大中小城市，形成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均居全球第一位的长江流域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观察员

◆重要文章

建设国家公园：有效保护有限利用

——云南省国家公园建设试点情况调研报告

文章详见第10版